

從《自由中國》談 1950 年代的救國團

鄭任汶*

目次

壹、前言

貳、《自由中國》的成立與言論方向

參、救國團的黨國教育任務

肆、探究《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評述

伍、結論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本文初稿曾以「從《自由中國》談 1950 年代的救國團」為題發表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辦之「轉型正義與民主鞏固」研討會，作者感謝研討會及與談人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蔡群立教授給予的寶貴意見，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建議與指正，使本文論述更為周全，當然，本文若有任何疏漏，概由作者自負。

摘要

威權政治體制用許多方式試圖由上而下統治著人民，面對擁有對內至高無上權力的國家機器壓制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理念的困境，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曾經透過辦報或辦雜誌刊物宣揚自由民主與法治的理念。1950年代的台灣是風起雲湧的時代，1947年2月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高壓鎮壓人民的反抗。在中國大陸，中國國民黨不敵共產黨的進逼，節節敗退，1949年全面敗退至台灣，為了統治所需，國民黨政府持續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法》等手段，授與政府緊急處分權，持續高壓統治著台灣社會。當時的知識份子意識到國家機器逐漸的壯大與持續的高壓統治，透過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宣揚自由主義的理念，並反對違反自由民主理念的國民黨政府，特別是在雜誌內文與社論中，針對黨國體制推動黨國教育的重要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提出諸多的檢討與批評。本文旨在探究《自由中國》對於救國團的體制、功能、目的與經費等面向的批判，並將這些批判鑲嵌 (Embedded) 在 1950 年代的政經環境之中，以分析其意義，作為理解威權政治體制治理社會的依據，希望能提供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工程時，追求公平正義社會的參考。

關鍵字：救國團、自由中國、轉型正義、黨國教育

壹、前言

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研究國家體制運作的重要視角，在威權統合主義之下，國家扮演著由上到下強勢主導的角色，透過對於社會團體的控制，讓社會意志符合國家的利益。因此有別於傳統尊重各社會團體自由意志的多元主義，威權統合主義體制中的國家，扮演著積極介入的角色，透過公權力的行使，介入影響政治決策，更賦予某些團體的特殊性，透過制度化的連結，讓這些團體擁有影響決策的特殊地位¹。在此情況之下，許多團體是依賴的，是被國家所穿透的（penetrated）²。在 1950 年代的台灣，中國國民黨敗退轉進台灣不久，有鑑於在中國大陸敗於共產黨的慘痛經驗，國民黨以高壓統治的手段治理台灣，因此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維持著上下統治的緊密從屬關係，對於言論市場或任何的媒體，國家都採取嚴格控管的手段，意識型態的控制也成為威權統治者極為重要的任務。

然而，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依然試圖透過發行刊物，表達對自由民主理念的追求與理想，創辦《自由中國》的最初構想來自於中國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之前，基於國共內戰日愈激烈，胡適、雷震、殷海光等知識份子對於自由民主的理念有所關懷，雖然局勢「迫使」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公開選擇與國民黨「站在一起」³，《自由中國》創刊籌劃之初，也受到蔣介石總統的默許與支持，雙方有著短暫的蜜月期，但隨著蔣介石政權在台灣持續加壓的威權統治手段，《自由中國》開始批判時政，提出與當時執政當局截然不同的理念與政策主張。

1 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36:85-131 (1974)。以及，丁仁方，台灣的統合主義，*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7 期 4 卷，1992 年，頁 34-42。

2 何明修，民間社會與民主轉型：環境運動臺灣的興起與持續，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新自然主義，2003 年。

3 任育德，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互動，*國史館館刊*，第 36 期，2013 年，頁 12。

時值台灣追求民主鞏固，以及透過轉型正義以實踐真正的民主法治之際，有必要針對《自由中國》針對救國團所提出的各項諍言與批判，釐清在威權統治時期，成立救國團的歷史脈絡，以及理解救國團成立與運作的特殊性。當然，仍必須特別指出，本文在研究過程中，乃以《自由中國》為文本進行研究，或許需要更詳盡的歷史資料，尤其若要徹底理解救國團運作的真實情況，未來調查之際更需要針對救國團與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的第一手史料，進行研究，以讓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得以更臻於完善。

貳、《自由中國》的成立與言論方向

《自由中國》的創辦始於國共內戰漸告尾聲的格局，1945 年中華民國接管台灣，根據 1946 年通過的憲法，舉辦了地方選舉，並開始準備實施地方自治⁴，不過，1947 年 2 月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反政府、鎮壓行動，致使台灣社會壟罩著肅殺的氣氛，1949 年中華民國大舉撤退至台灣。國共內戰的情勢劇烈發展，再加上台灣政局的不穩定，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希望籌組一個以反共為宗旨的「自由中國大同盟」，並發行刊物以號召同志反共、阻止政府走向投降之路⁵，但情勢變化太快，1949 年 1 月共產黨軍隊進入北平，10 月 1 日共產黨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控制的地區只剩中國西南與沿海地區。國共戰爭的一面倒局勢，讓原本計畫在中國上海創辦的《自由中國》⁶被迫中斷，期間，雷震等人也欲請胡適出面主導此事，雷震更曾與王世杰

4 王御風，台灣選舉史，好讀出版，2016 年，頁 23-46。

5 雷震，1950 年 3 月 25 日日記，雷震全集，第 31 冊，桂冠，1989 年，頁 166-167，相關過程可進一步詳見，雷震，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遠流出版，2003 年，頁 33-34。

6 薛化元，自由中國雜誌自由民主理念的考察 -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129。

前往溪口，向當時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報告《自由中國》的籌備工作，並獲得蔣介石的允諾支持⁷。1949 年中，蔣介石抵達台灣，並幾次來往國民黨控制的中國部分地區與台灣兩地，10 月中，雷震也來到台灣但仍不忘此事，10 月 26 日雷震立即邀集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張佛泉⁸等人討論《自由中國》的出版計畫。

最後《自由中國》終於在 1949 年 11 月在台灣正式出刊，一開始，對於是否擔任發行人的問題，人在美國的胡適有所疑慮，但在雷震力主，以及當時已經就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力促之下，胡適才得以就任發行人⁹。亦即，《自由中國》的創刊一開始的確獲得蔣介石的首肯或支持，同時，根據相關訪談資料也顯示基於反共的共同立場，當時亦獲得教育部長杭立武的支持，「杭立武除了言語上、精神上的鼓勵之外，並向雷先生承諾，將由教育部按月補助《自由中國》三百美元的經費，不足者則由雷先生另行籌措¹⁰。」

韓戰改變了當時的東亞國際政治局勢，也影響到蔣介石對於台灣內部控制的力量，隨著局勢穩定之後，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地位越來越穩固，越來越能控制住局面。有鑑於在中國大陸節節潰敗的經驗，國民黨政府正式轉進台灣之後，進行黨政軍集權化的強人統治，但在內部，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們依然在胡適所開起的「保護傘」之下，在威權統治

7 同上註，以及，萬麗鵑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7），2001 年，此選集中，前自由中國社經理馬之驢在所寫的序中表示，「因為當年無論成立一自由中國反共運動組織，或在上海辦一份報刊，請胡適先生出面領導等情，是王世杰親率雷震去溪口，向已下野的蔣介石總統報告的，當即得蔣面允並願資助經費」，頁 ii。

8 吳乃德，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衛城出版，2014 年，頁 24-25。

9 萬麗鵑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7），2001 年，頁 9-13。後來，王世杰（字雪艇），又因另外交事件，於 1953 年底遭到免職，亦有論者認為，這是蔣介石開始打壓自由派人士的先聲。同前註，頁 53-56。

10 請參閱，馬之驢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雷震案史料彙編：雷震回憶錄焚毀案，國史館出版，2003 年，頁 378-380。

的夾縫中勇敢批評時政，勸諫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¹¹。許多社論的撰寫者均為當時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雖然彼此之間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看法彼此有差距¹²，但胡適、雷震、殷海光可說是《自由中國》雜誌的三巨擘¹³，負責相關的撰稿、編務、發行等工作。1949年11月20日創刊，由胡適掛名的發行宗旨，即定調為自由、民主、反共¹⁴，可謂「集結一群為省籍知識份子，不但鼓吹民主與人權理念，還正面批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獨裁、違反民主、侵犯人權¹⁵。」

半月刊的《自由中國》，可說是 1950 年代扮演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旗手¹⁶。1950 年 1 月 3 日，蔣介石接管台灣政事，3 月 1 日「復行視事」並正式進駐總統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觀察到批判，尤其是《自由中國》與蔣介石雙方的蜜月關係很快的結束，1951 年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批評了保安司令部的金融管制政策，文中痛罵「一件有計畫而大規模的誘人入罪的金融案」，讓《自由中國》與蔣家政權的關係惡化，即便雷震當時還擁有國大代表與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要職的身分，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依然派人至雷震家門前站崗，待命抓人¹⁷。這也引發雷震、胡適等人的不滿，在胡適寫給雷震的信函中，胡適甚至以「《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有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以及為表對〈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一百

11 陳儀深，一九五零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 47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91。

12 甚至在創刊時，胡適對於是否掛名發行人，有所疑慮，雷震與胡適兩人之間亦有所爭執。後來，雙方對於是否組織新黨亦有不同意見。詳可見，任育德，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互動，國史館館刊，36 期，2013 年，頁 14-16。

13 顏伯川，民報，《自由中國》雜誌三巨擘——胡適、雷震、殷海光，2014/12/20。網址：<http://www.peoplenews.tw/news/5c71ce4d-56fd-4200-8775-dd6505862c76>，最後瀏覽日：2017/9/5。

14 胡適，自由中國的宗旨，自由中國創刊號，1949/11/20。

15 吳乃德，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衛城出版，2014 年，頁 14。

16 同註 11。

17 同註 10，頁 382。

分的贊成與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憤而辭去發行人一職¹⁸。

在教育問題上，《自由中國》的言論部門對於蔣家政權積極成立救國團，更是非常不以為然，刊出一連串的社論或讀者投書，質疑救國團成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1952 年 5 月更直接刊出徐復觀主筆的〈「計畫教育」質疑〉，反對國民黨以黨國的力量介入教育。期間，1952 年 3 月 25 日當時的立法院還三讀通過了出版法，成為箝制新聞自由的惡法¹⁹。至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國民黨政權的對抗角力，已經公開檯面化，彼此戰鬥情況激烈。

然而，挾著黨國威權體制的集權力量，1952 年 10 月 31 日救國團特別選在蔣介石壽誕成立，由行政院籌組，納編在國防部底下。對此發展，基於自由、民主、反共的理念，《自由中國》遂展開強烈的言論批評，社論與文章的砲火日益猛烈。包括：1952 年 6 月刊出的〈對我們教育的展望〉，1952 年 10 月刊出徐復觀主筆的〈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1954 年 12 月刊出余燕人等投書〈搶救教育危機〉，文中直指「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以假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我們是民主國家，我們不能自欺欺人。」《自由中國》的言論部門對於救國團的成立與運作，顯然極度不滿，因此分別從民主、自由、法治等角度，猛烈批判救國團的成立與運作。1956 年 10 月羅大年的文章〈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更直指救國團和三民主義、總理遺教、總統訓辭、總裁言論、救國團發下的小冊子等，根本是自由教育的弊害，必須予以「剷除」。

這段期間東亞情勢漸趨穩定，1953 年艾森豪就任美國總統明確表明

18 同註 9，頁 23-24。

19 相關箝制新聞自由與自由中國之間關係的討論，可詳見，林淇濱，威權／霸權與新聞自由權——以 1950 年代「自由中國」的言論苦鬥為例，台灣史研究，第 24 期，2005 年 3 月，頁 25-51。

協防台灣的立場，1953年7月27日韓戰停戰協定，終結了為期三年的東北亞火藥庫風暴，東亞的國際局勢有所變化，美國持續協防東北亞，以防堵共產勢力的推進，1954年9月共軍炮擊金門，年底12月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台灣而言，這段期間美援計畫的繼續執行，蔣介石所領導的政權暫時穩固，也讓國民黨政權持續強化對內部的高壓統治。

但相對的，勇於批判時政的《自由中國》，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想繼續進行言論上的批判²⁰。例如：1954年刊出的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毫不避諱的批判救國團公然介入教育不當，再加上《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政權在其他自由民主理念上的衝突，從1952到1960年之間，《自由中國》光是直接針對教育與救國團的問題，所刊出較具重量的社論或讀者投書至少高達13篇以上²¹。

1954年蔣介石對雷震的憤怒開始檯面化，乃至公開爆發²²，另外，1955年亦爆發孫立人案，蔣介石對內開始逐步展開清算異己的鎮壓行動，雖然礙於國際社會與美國的壓力，讓中國國民黨政府有所顧忌，但內在情勢的演變，實在無法見容於蔣介石所領導的政權。《自由中國》除了猛烈批評蔣介石的諸多作為之外，也逐漸希望結合台灣本土力量，組成反對黨，此舉更加觸怒國民黨當局。

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七十歲大壽之際，《自由中國》出刊〈祝壽專號〉，痛批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反民主與不當施政，此期大賣，加印數次，蔣介石與國民黨當局最終動手，除了透過軍中特種黨部、

20 更多有關自由中國雜誌基於自由主義而出發的分析，可詳見，薛化元，自由中國雜誌自由民主理念的考察－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卷第1期，1995年，頁127-159。以及，王之相，一位自由主義者的戰爭，思與言，第49卷第1期，2011年3月，頁81-104。

21 潘光哲、陳儀深、薛化元等編選，自由中國選集6－黨國體制的批判，稻鄉出版社，2003年，頁153-244。

22 同註12，頁26。

官方媒體與機關發動「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文攻之外，在 1956 年 12 月即開除雷震黨籍²³。〈祝壽專號〉讓雙方徹底翻臉，國民黨政府不但開始監控雷震的行蹤，更恐嚇印刷廠不得協助印刷²⁴。但《自由中國》似乎並沒有退縮，1957 年之後更加強火力，公開跟蔣介石所領導的政權唱反調，連續七個月以社論方式推出 15 期有關今日問題的討論²⁵。1960 年蔣介石第二任總統任期即將屆滿，但卻違法繼續連任總統，《自由中國》的火力更加猛烈。不但胡適主筆寫了〈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總統祝壽〉，用艾森豪的例子，反諷蔣介石集權專制，應該要學艾森豪授權分工，雷震、陶百川、蔣勻田、徐復觀、徐道鄰等都動筆狠批蔣介石²⁶。

任何威權政權的維繫都需要強制的政治力與文化霸權的控制，在國際政治中極為常見。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當然不容許這些異見，運用任何可能的手段進行由上而下的集權控制。1960 年 9 月 4 日雷震遭到警備總部以叛亂罪為名逮捕，理由之一是《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5 期刊出的〈大江東流擋不住〉，該文痛批政府高壓統治、黨國不分，並力陳籌組新黨的必須性²⁷。三天後，雷震以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的罪名遭到警備總部逮捕，最後，《自由中國》遭到停刊。雷震的被捕導致《自由中國》停刊，雷震所積極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也

23 當時雷震並未入黨，但蔣介石依然裁示，那也要開除。有關「向毒素思想總攻擊」與國民黨註銷雷震黨籍之過程，可詳見，楊秀菁，權衡下的 10 年罪責：雷震案與 1950 年代的言論自由問題，國史館館刊，第 40 期，2014 年 6 月，頁 116-118。

24 武之璋，旺報，兩岸史話 - 自由中國雜誌的起落與影響，<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005000841-260306>，2014/10/5。最後瀏覽日：2017/9/5。

25 李筱峰，雷震與台灣民主運動，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網站，http://www.twcenter.org.tw/thematic_series/history_class/history03，最後瀏覽日：2017/9/10。

26 武之璋，旺報，兩岸史話 - 自由中國雜誌的起落與影響，<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006000858-260306>，2014/10/6。最後瀏覽日：2017/9/5。

27 當時組織新黨的過程，可參見，陳正茂，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 - 一九六〇），秀威資訊，2009 年。

從此中輟，此一被視為戰後台灣政治與媒體史上最受矚目的案件，史稱「雷案」²⁸。

《自由中國》半月刊從 1949 年 11 月 20 日到 1960 年 9 月 1 日最後一期，共 11 年，發行 260 期，每期發行量可達 12,000 本²⁹。總之，《自由中國》從自由、民主、反共的創刊宗旨出發，因反共，再加上東亞情勢的轉變，美國介入東亞政局，蔣介石有意拉攏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初期，雙方互容和平相處，但隨著蔣介石的高壓統治手段不斷加強，《自由中國》的言論批判炮火更加強烈，在言論中對國際情勢與中國問題、黨國體制的控制、地方自治選舉與反對等面向³⁰，批評當時政權的反民主與施政不當，相關言論絕大部分與國民黨政權格格不入，甚至立場相悖。最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敵不過擁有絕對統治權力的黨國機器，《自由中國》最後停刊，雷震被捕入獄。

參、救國團的黨國教育任務

有鑑於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經驗，在蔣介石掌權下的中國國民黨政權非常重視對青年學子的政治工作，1952 年 3 月 29 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青年書」，1952 年 10 月 31 日正式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作為黨化教育的重心³¹，並再輔以強大的組織、強制力、意識形態、獨占利益資源，以作為威權侍從統治的後盾³²。接下來本研究將初探救國團的黨

28 林淇瀟，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收錄於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遠流出版，2003 年，頁 23。

29 潘光哲、陳儀深、薛化元等編選，自由中國選集 6- 黨國體制的批判，稻鄉出版社，2003 年，頁 1。

30 此分類面向引用自，薛化元、陳儀深、潘光哲等編選，自由中國選集，稻鄉出版社，2003 年。

31 張淑媚，評析〈自由中國〉雜誌對戰後初期救國團教育（1950-60）之論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2 卷第 3 期，2016 年 9 月，頁 151。

32 林佳龍，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1 期，1989 年夏，頁 117-143。

國教育任務，接著探究《自由中國》對於救國團的體制、功能、目的與經費等面向的批判，試圖將這些批判鑲嵌在 1950 年代的政經環境之中，以分析其意義，以理解國民黨主導之下威權政治體制的作為，並作為政府進行轉型正義工程時的參考。

國民黨政府在正式遷台之前，有鑑於在國共內戰中，國民黨頻頻失去知識青年的認同與支持，國民黨政府已有設立青年救國團的準備，1948 年底「國民黨中常會九日上午舉行例會，戡亂動員工作隊編組辦法，據悉：該隊編組工作即將開始實施，中央黨部大部分職員同志，均將參加此一負有重要使命之戰時服務工作，聞隊長一職，可能由胡軌擔任³³。」亦即，救國團成立之初即計畫納編在國防部底下³⁴，在宣言中更直言「青年救國團是青年群衛先鋒，運動中的選手，是政治的黃埔，是經濟上的憲兵，是民族的衛士，是社會的靈魂，國家的生命力³⁵。」循此脈絡，在救國團的歷史中，亦完全承擔起反共救國的任務，1952 至 1969 年隸屬於國防部，1969 年後才改隸內政部，並申請為社團運動機構，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台灣民主浪潮風起雲湧，隨著人民團體法立法，1989 年救國團才正式登記為社團法人³⁶。至今，在救國團 65 年的歷史中，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長達 37 年直接隸屬國防部與內政部，後來的 28 年才依法成立法人。

成立於「總統華誕」的救國團，由當時的總統蔣介石為首任團長，蔣經國為首任主任，兩名副主任為胡軌與鄧傳楷，這樣的安排在威權統治的時代，頗有替總統慶賀的用意。在救國團的歷史中，蔣介石也曾經直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直接指示救國團所應該擔負的黨國任務，例

33 台灣民聲日報，1948/12/11。

34 聯合晚報，李鍾桂：救國團跟國民黨沒關係，黨產會別裁臧，2017/9/18。

35 同註 33。

36 同註 34。

如：「主持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278 次會議，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業務，指示應注意：一、對失學失業青年輔導就業技能，二、對不良青年予以適當之誘導，三、對展開青年之各種文化活動應研究具體計畫……³⁷。」1957 年 8 月 7 日蔣介石亦在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380 次會議中指示救國團的工作，其中的第六點「六、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國防部所屬單位之一，亦為黨內重要青運機構。今後對重要工作之策劃與執行，均應先呈報中央，接受黨的領導，冀以增進青運工作之效果³⁸。」救國團承襲來自黨國體制最重要的決策機構——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所賦予的任務，進行「青運」工作，即所謂的青年運動，救國團接受黨的指揮與領導，希望達成青年學子效忠於黨國體制的目標。

救國團的歷任主任亦為重要的國民黨黨政要員，包括：蔣經國、李煥、李元簇、宋時選、潘振球、李鍾桂、林炯圭、周逸衡、張德聰、葛永光等人，其中任期最久的是 1952-1973 年長達 21 年的蔣經國，以及 1987-2008 年長達 18 年的李鍾桂，其他歷任主任任期多在 10 年以下。團徽更是與代表國民黨黨國的符號密切連結，包括：「青天白日代表國家的靈魂，代表三民主義的精神和中心思想，青天白日兩邊的三根紅條，是代表青年勇敢、犧牲和大無畏的精神，團徽（旗）以綠色為底，是象徵中國青年有活力、有生氣、永遠進步、永遠青春³⁹。」救國團的活動，可分為靜態與動態之分，靜態活動以講述革命工作理論、團務工作、反共任務、愛國教育等為主，動態則是以戰鬥訓練、登山、健行等「培養符合時代需要的戰鬥技能」、革命訓練等為主⁴⁰。此也符合蔣介石在救國

37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七八次會議紀錄，轉引自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國史館，2014 年，頁 428。

38 轉引自，聯合報，救國團是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黨產會引兩蔣檔案佐證，<https://udn.com/news/story/8598/2763210>，2017/10/17，最後瀏覽日：2017/11/1。

39 救國團網頁，<http://www.cyc.org.tw/about#6>，最後瀏覽日：2017/9/11。

40 陳耀宏，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後初期的動態活動之概況：民國 41（1952）年至民國 50（1961）

團成立訓詞所指示的革命青年、三民主義最高指導原則、反共抗俄總動員、戰鬥性組織、全面改革等訓示，總之，救國團肩負著教育性、群眾性及戰鬥性的時代性任務，並透過由上而下模擬黨部的嚴密組織，傳達給高中以上的青年學子愛國、愛領袖的意識⁴¹。從成立、制度、運作與任務來看，救國團與具有時代性的黨國教育任務密切相關。

在黨國不分的時代，擔負著控制意識形態任務的救國團，從成立一開始就有著「反共救國」與「教育」的任務，救國團也秉持著成立宗旨，取得比其他社會團體更有優勢（dominate）的獨佔地位，舉辦活動獲得軍方的提供與協助，由軍方提供極大比重的場地設施，委託軍方辦理的營隊，更利用軍方的設施，畢竟許多活動場所大多屬於管制範圍，因此有賴軍方的支援⁴²。救國團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的辯論，各方論者從歷史、法治、實質控制等面向多所辯論⁴³，「附隨」的定義亦可分為直接隸屬與控制，以及間接隸屬與控制，但在威權統治時期，救國團的確擔負著黨國教育的任務，並比其他團體擁有更具優勢的地位，直接受到黨政軍各單位的協助，以便執行其被黨國體制所賦予的任務。

年之動態青年活動，體育學報，第 14 期，1992 年，頁 177-192。

41 同註 31，頁 153-155。

42 陳耀宏、蔡禎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全國動態青年活動之歷史變遷，體育學報，第 15 期，1993 年，頁 5、7。

43 亦有論者主張，「不論從人事、財務、業務經營各方面來看，救國團都從未被特定政黨實質控制。」詳見，董保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附隨組織」之研究 - 以救國團為例，台灣法學雜誌，2017 年 6 月，第 322 期，頁 94。以及，救國團公開發表之說帖，網址：<file:///C:/Users/jwc/Downloads/%E4%B8%AD%E6%96%87%E8%AA%AA%E5%B8%96106.9.12%E6%A0%A17.pdf>，最後瀏覽日：2017/10/20。

肆、探究《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評述

《自由中國》不但對許多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議題提出針貶批判，更對由當時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所一手扶植創立的救國團多所抨擊。從 1952 到 1960 年，《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設立與運作，從委婉建言到強烈抨擊並主張「撤除」，在立場上有著階段性的轉變⁴⁴。而這段期間，《自由中國》直接針對教育與救國團的問題，透過刊物的邀稿、撰寫、編輯等工作進行猛烈的批評，如表 1 所示。承上所述，本研究從《自由中國》所質疑的體制、功能、目的、經費等四大問題面向，探究在《自由中國》所刊出的社論、讀者投書等文章中，對於救國團所提出的批判與建言。

44 同註 31，頁 151-171，以及頁 163。

表 1 選輯《自由中國》批判救國團文章一覽表。

時間	期別	標題	作者	批評救國團之問題面向
1952/5/1	6卷 9期	計畫教育質疑	徐復觀	體制、功能
1952/10/16	7卷 8期	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	徐復觀	體制、功能、目的
1952/12/16	11卷 12期	搶救教育危機	余燕人等	功能、目的
1956/10/31	15卷 9期	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	羅大年	體制、功能、目的、經費
1958/1/1	18卷 1期	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十二）	社論 傅正	體制、功能、目的、經費
1958/6/1	18卷 11期	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	社論 傅正	體制、功能、目的、經費
1958/6/16	18卷 12期	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	讀者投書 路狄	體制、功能、目的、經費
1960/9/1	23卷 5期	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	社論 傅正	體制、功能、目的、經費

說明 1：本表由本研究自製，僅選出直接針對救國團問題進行討論之文章，並參考《自由中國》各期期刊，以及薛化元、陳儀深、潘光哲等編選，「自由中國選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年。

說明 2：除表列文章之外，尚有並未直接點名救國團，但就整體教育問題提出評論與建言之文章，還包括兩則讀者投書：葉宏琛，〈何謂標準教科書？〉，自由中國，11 卷 5 期，1954 年 9 月 5 日；謝琇茹，〈異哉所謂安全室主任〉，自由中國，18 卷 1 期，1958 年 1 月 1 日。以及三篇社論：〈我們的教育—今日的問題（十三）〉，自由中國，18 卷 2 期，1958 年 1 月 16 日；〈學術教育應獨立于政治〉，自由中國，18 卷 10 期，1958 年 5 月 16 日；社論，〈黨霸教育的真面目—兼論政大教授李聲庭解聘事〉，自由中國，23 卷 3 期，1960 年 8 月 1 日。

一、體制問題

從救國團醞釀成立，乃至正式成立，《自由中國》持續表達質疑與批判的立場，並多次提出「撤銷」、「再撤銷」的嚴正建議。在體制問題上，在以徐復觀署名的社論中，對救國團的體制不符提出建言，「此一團體的性格尚不夠明朗」，甚至提出建議救國團主任乾脆由教育部長兼任，以領導學校青年為主的建議，此篇社論出自新儒學重要學者徐復觀之手，主張政府的各種機構，需經行政院院務會議或立法院之通過，人民團體更要符合內政部主管的各種規定，「我竭誠希望青年反共救國團與正式成立之前，能將法律的基礎打好，則將來方不至有負總統之號召⁴⁵。」

《自由中國》提出救國團在體制上的不明朗問題，更刊出社論質疑「青年救國團成立迄今，已五載於茲，但這一單位究竟是何種性質，社會上還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所可怪的，雖然團章上有所謂申請加入的說法，事實上，卻規定高中以上學生一律參加。」、「這種強迫參加的方式，一如過去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強迫學生參加⁴⁶。」在同一篇社論中也再度質疑，救國團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未經立法手續，批評救國團成立太過草率，「法外的這種黑機關便該根本撤銷⁴⁷。」在運作上，《自由中國》亦曾在社論中載明，「例如在今年（四十六年）六月間，青年救國團發動荒唐的鬼湖探險時，據六月十六日台北各報所載幼獅設訊說，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於昨日下午四時，在該團會議室邀集教育部、國防部、經濟部、陸軍供應司令部、交通處、警務處及農復會等有關單

45 自由中國社論，「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自由中國，第7卷第8期，1952年10月。

46 自由中國社論，「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 - 今日的問題（十二）」，自由中國，第18卷1期，1958年1月。此「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乃由傅正執筆，強烈主張裁撤破壞法治、浪費公帑的救國團，相關討論亦可見，吳乃德，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衛城出版，2014年，頁70。

47 同上註。

位舉行會議，商討有關青年鬼湖探險問題，會議由該團曾憲鎔組長主持……⁴⁸。」《自由中國》對於救國團違反政府體制運作頗多批評，抨擊救國團跨越既有的政府體制，直接邀集各部會開會，商議救國團的業務，此點也凸顯出在體制運作上，救國團遭人非議之處。

即便《自由中國》大聲疾呼，也提出為了避免學校行政受到雙重指揮，唯有撤銷救國團才不至於混亂的建議⁴⁹，但救國團依然按照既定的方式成立，《自由中國》另外刊出的評論，直指「但青年救國團卻憑藉其特殊的背景與地位，而置國家法制於不顧⁵⁰。」不過，言之鑿鑿，相關的言論批判絲毫無法撼動國民黨政權的作為。

二、功能問題

《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質疑與批評，不僅曾經臚列七個前提，包括：青年都是國家的、青年以受基本教育為主、學校是正常的教育組織、工作是分工的、國家應對青年的義務有明確的法定規範、總統應該提倡權責分明的工作科學化、注重青年的基本教育等⁵¹，《自由中國》的言論立場更強調社會的分工，從功能上對設置救國團與政府許多部門的功能相重疊，提出批判。「在組織上，它缺乏與國民黨的明朗關係」、「據團徽的說明，中間的青天白日，乃國民黨黨徽，在於啟示中國青年，明瞭中國知本源，從而知報國之道。」在功能上，「我們不能認為學校不能負擔青年教育，或以學校為不可靠⁵²。」在質疑救國團與學校的重疊性之外，《自由中國》也對救國團與國民黨之間的疊床架屋多所

48 同上註。

49 同上註。

50 同上註。

51 自由中國社論，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自由中國第 7 卷第 8 期，1952/10。

52 同上註。

批判，「此一團體，是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指導之下的，這與國民黨並無不同。其負責人如蔣經國、周至柔、程天放諸先生等，都是國民黨的核心幹部。」並對救國團的層級組織與國民黨大同小異提出質疑，「然則此救國團的青年組織，對於國民黨到底是處於怎樣的一種關係呢？已經入了黨的青年，還是否要入團？已經入了團的青年，還是否要入黨？」顯見，在當時救國團與國民黨在身分與功能上的高度重疊性，致使《自由中國》提出嚴重的質疑。

在人事問題上，《自由中國》的言論更加猛烈，進一步刊出社論批評，「但由於青年救國團總團部負責策畫人員，既沒有受過良好的普通教育，又沒有受過正軌的軍事訓練，例如該團業務上的主要負責人主任秘書，只不過是警察學校出身，其餘便可想而知了⁵³。」此篇社論明指救國團最主要的中心工作，顯然是推行軍訓，因此把言論砲火對準當時在各大專學校中負責軍訓教育的教官。

三、目的問題

救國團的成立，固然有服務社會、終身學習或舉辦旅遊營隊的目的，但在威權統治體制下，救國團亦擔負著黨團教育的任務，並具有在意識形態上鞏固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目的。作為 1950 年代最重要異議媒體的《自由中國》對此問題面向則有所質疑，1954 年刊出的讀者投書中，直指「教育當局、學校當局、救國團並經常舉行考試，以察看學生們是否背念得如家譜一樣的爛熟」、「自青年救國團成立以來，這種課外活動可謂貪求不厭，有增無己。」、「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以假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我們是民主國家，我們不能自欺欺人⁵⁴。」這篇讀者投書，激怒了蔣介石，蔣直接下令要開除其實並未登記黨籍的

53 同註 46。

54 余燕人等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自由中國第 11 卷第 12 期，1954 年 12 月。

雷震⁵⁵。

但《自由中國》也毫不退縮，1956 年刊出羅大年署名的〈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乾脆直接把救國團當作是教育上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另一問題則是研讀總理遺教、總統訓詞、總裁言論、三民主義問題。文中亦強烈批評救國團強迫同學參加、違反民主教育，以及干擾學校行政、浪費公帑⁵⁶。

從《自由中國》的社論或讀者投書中，其立場多所質疑救國團的成立運作與黨國體制欲嚴密控制校園相關，但《自由中國》基於維護大學教育自主，以及民主社會對教育該有的政策主張，猛烈批評救國團，最終勢必觸及國民黨當局的底線。

四、經費問題

救國團的經費來源與使用，一直遭到《自由中國》的強烈質疑，即便《自由中國》鮮少針對個別的補助、收入或支出提出批判，但依然強烈抨擊救國團整體的經費來源與使用情況。「今天國力這樣艱難，政府在各方面都盡量樽節開支，公教人員和前方戰士的待遇如此微薄，而坐視救國團的浪費公帑，這是不可以理解的一件事⁵⁷。」在另一篇社論中，「但青年救國團卻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例如去年（四十五年）一年的開銷，據傳便高達台幣三億元左右，這當然是青年救國團的高度機密，非局外人所能證實。但尤其三天一活動，五天一訓練的情形觀之，便不難想見其開支之浩繁了⁵⁸。」

55 同註 41，頁 151-171，以及頁 157。

56 羅大年投書，「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自由中國第 15 卷 9 期，1956 年 10 月。

57 同上註。

58 同註 46。

綜觀《自由中國》對救國團所提出的評論與建議，言論砲火日益猛烈，甚至到了 1958 年乾脆在社論中直接呼籲撤銷救國團，「青年反共救國團之應該撤銷和只有撤銷，才是正常建制的途徑⁵⁹。」此言論一出，當然引發執政者的極度不滿，攻擊《自由中國》的論述盡出，救國團也以發表「告全體團員書」作為回應，而《自由中國》與 1958 年 6 月也再刊出「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雙方在言論上持續駁火，就救國團成立的理由、成立的根據、法制問題與經費問題多所辯論。此篇社論中，《自由中國》再度闡明「無論從其成立的理由及根據以至工作的後果上說，都該撤銷；而且也只有撤銷，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的主張⁶⁰。

即便執政當局已經大舉反撲，但《自由中國》仍在下一期繼續刊出以「路狄」為名的讀者投書 - 「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更加嚴厲批判救國團的思想教育有害無益、疲勞轟炸，也批評救國團的經費問題，「今春舉行的六個所謂學術性的青年年會用了多少錢，始終未見報告。為何不報告，無非是怕人知道，怕人攻擊。」「共計浪費多少國帑，是無法知道的，也是無法想像的⁶¹。」

直到 1960 年 9 月《自由中國》所刊出的最後一篇社論「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總結了《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批評，「足見青年救國團這個原無法律的機構，在軍訓劃歸教育部主管後，連當初由行政院規定成立的唯一理由也喪失了。因此，照理說，政府更該趕早撤銷青年救國團了！」從自由主義理想出發的《自由中國》接連針對體制、功能、目的、經費等問題面向提出質疑，呼籲乾脆撤銷救國團，但面對仍不容下異己的威權體制，《自由中國》終究還是走向「被撤銷」

59 自由中國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1 期，1958 年 6 月。

60 自由中國社論，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 期，1958 年 1 月。

61 路狄，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2 期，1958 年 6 月。

之路。

伍、結論

對於《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機器的衝突與不相容，有論者分析此衝突反映在「權力矛盾」與「意識形態衝突」等兩個場域，前者涉及雷震對蔣介石領導風格的不滿，以及針對「國防部總政治部為指揮中心的軍情特系統，以青年反共救國團為中心的青年組織」，當時此亦涉及蔣經國接班問題的布局，《自由中國》提出強烈批判，後者即是自由主義思想與威權思想的衝突⁶²。在探究《自由中國》對於救國團的體制、功能、目的與經費等面向的批判，以及檢視在 1950 年代的政經環境之中，參與《自由中國》知識分子的經歷與他們對當時政經問題所做出的回應之後，本研究承上述論點，《自由中國》在權力場域內，直接挑戰威權統治體制，更從思想層面的論述，衝擊到以高壓統治手段為基礎的威權黨政軍情特系統，最終造成威權統治者動員國家機器強迫《自由中國》走向停刊之路。

承上述，本研究初步的結論如下：

第一、1960 年 9 月 4 日雷震被捕，《自由中國》被迫停刊，這是威權統治的必然勝利。威權統治者無法忍受在言論上頻頻對執政提出批判的刊物，為了強化在意識形態上的控制，即便是來自同樣反共且曾經彼此友好的同志，但基於統治與鞏固政治權力的需求，最後終於強迫《自由中國》停刊，讓言論回歸一言堂。

第二、作為威權體制的控制學校機構與青年思想的工具，在威權統治主義之下，救國團透過國家機器的力量，在校園與社會教育領域

62 林淇濱，2003 年，「導論：一步一步走入黑牢的所在」，收錄於雷震，「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遠流出版，頁 34。另，由蔣介石直接下令指揮，致使雷震被捕入獄，多數論者認為與雷震組黨和《自由中國》的言論有關，惟尚待未來更多史料、檔案、文稿、日記、書信等出土，才能有更完整的分析，相關討論可參閱雷震史料彙編、回憶錄等文獻。

中繼續深耕，就維繫威權體制的角度而言，救國團有其時代背景的意義，其成員與工作範圍，肩負鞏固黨國體制的任務，對於此組織而言，這是無法避免的「義務」。只是，《自由中國》直接批判此一威權體制的核心，特別是原本應該基於共同的反共立場，起初甚至與威權政府在反共立場上具有一致性的文宣「工具」，竟然毫不掩飾的從體制、功能、目的、經費等面向全面性的攻擊救國團，導致最後威權統治者終於全面動員國家機器，決定剷除異己。

第三、知識份子取之於自由主義的言論觀點，終究不見容於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權逐步施加高壓統治，對出版、媒體、文化的壓迫與箝制，持續到 1987 年解嚴，就此面向，《自由中國》停刊後，威權統治者持續對傳播媒體或文化事業進行控管，再加上出版法與戒嚴等手段，確立了威權體制在文化霸權上的統治基礎。

第四、民主鞏固的維繫，包括民主制度的強化與民主價值的維繫⁶³，除了透過自由公平的民主選舉選出新政府與各級議會之外，自由民主與公平正義的價值與文化，更是民主體制得以持續運作的條件。因此，從《自由中國》對於救國團的批判中，亦可見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對於民主價值與文化的堅持，以及對抗威權體制及強人政治的堅持與勇氣。

循此，探究《自由中國》對於救國團問題的評述，《自由中國》亦屢屢提出改善現況或解決問題之道，例如：「反共青年救國團，似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社會青年，這是志願的，大體照已分佈的團章去做，但其工作範圍應大加縮小；一為在學青年，應全體加入以學校的組織為團

63 有關民主鞏固的概念，可詳見，Diamond, Larry. March/April 2008. "The Democratic Rollback—The Resurgence of the Predatory State," *Foreign Affairs*. 最後瀏覽日：2009/8/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218/larry-diamond/the-democratic-rollback>。以及，Diamond, Larry. March 1997.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50, NAFTA.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12-41.

體的組織。」《自由中國》也多次從民主政治運作與法治的角度，提出直接撤銷救國團的提議。若對照當前在面對轉型正義工程的壓力時，救國團前主任李鍾桂提出的服務化、休閒化、志工化⁶⁴，以及救國團前召集人白秀雄提出的轉型公益團體⁶⁵，早在 1950 年代《自由中國》的許多倡議，諸如：遵照法治、勿干涉教育、財務透明、勿使用國家資源等，即便早已超越半世紀之後的今日，《自由中國》的建言依然可稱上是具有建設性的諍言。

救國團本該作為一個「非營利、非政府」的公益性組織，但在黨國體制的庇蔭之下，救國團發展規模龐大，其組織持有遍佈在全台各地的資金、土地、建物等。據監察院 2011 年的調查報導，救國團長期佔用國有非公用土地、低價承租國有土地、長期無權占有使用部分縣市公有土地等，再加上長期以來教育部、國防部與救國團之間模糊不清的關係，在 2011 年的總資產已經超過 53 億多元，「按該團組織規程規定，其總團部設有 8 處 1 會，並分設 19 處縣市團務指導委員會、13 處青年活動中心、9 處輔導中心、3 處學苑及青年服務社等。」並有轉投資多家企業與子公司⁶⁶。其中，部分救國團占用公有地訴訟案已遭法院判決敗訴⁶⁷，但依然有許多問題尚未得到民主政治下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最終解決。

64 金門日報，救國團金門縣團委會新任主委昨佈達，2002/8/2，<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08963/?eprint=pt>，最後瀏覽日：2017/10/9。

65 聯合報，救救國團，白秀雄：轉型公益團體，2017/9/20，<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2712181>，最後瀏覽日：2017/9/20。白秀雄於 2017 年 12 月 6 日因理念不合，提出辭呈辭去救國團理事長、理事等職，可詳見，聯合報，救國團高層不滿改革案，白秀雄請辭，2017/12/6，<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2860776>，最後瀏覽日：2018/1/10。

66 監察院調查報告，2011 年 9 月，劉委員玉山、楊委員美鈴調查，中國青年救國團歷年來承租、價購、撥用或占用國有地，爭議不斷，雖前經本院於 88 年調查並糾正在案，惟成效如何，復國有財產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有無善盡職責等情乙案。可參見：<https://www.cy.gov.tw/sp.asp?xdURL=.%2Fdi%2FRSS%2Fdetail.asp&ctNode=871&mp=1&no=1340>，最後瀏覽日：2018/2/2。

67 自由時報，占用國有地訴訟 救國團連 4 敗，2017/2/11，此四案包括：志清大樓案、台中公有地案、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案、雲林縣國有地案、台北學苑案等，可參見：<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77181>，最後瀏覽日：2018/2/3。

總結以上論述，若論及台灣的民主化，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優越性的信念不斷鬆動，對於民主體制內主要機構的信任度更是滑落谷底⁶⁸，其背後因素非常繁雜，但對於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民主政治運作而言，社會大眾與知識份子們有著非常高的期待，其中，面對各種政治或社會團體的運作，建立符合民主政治運作原則的體制，更有助於提升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度。因此，救國團所引發各種問題的最終解決之道，必須以公共利益與整體國家民主制度的健全發展為要。回顧 1949 至 1960 年之間《自由中國》刊物對救國團的評述與批評，相關問題至今未解，而救國團依然持續運作中，此正是台灣民主發展數十年以來的攸關轉型正義工程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個案。然而，各方論者有許多不同的評價，但假若可以持續進行中國國民黨、救國團對外出版或內部文獻資料之研究，以致使更多史料攤開在陽光之下，並在處理救國團財產、資金、組織、人事變革等問題上，最終有比較成熟且符合民主政治、社會公平正義等原則的方案出爐，例如：歸還佔有國有地產權、救國團租房舍之租金回復正常市場估價機制、人事組織徹底去政黨化、完全釐清教育部與救國團的不正常關係等，那將不失為作為台灣推動轉型正義與民主改革的代表範例之一。

68 朱雲漢，反思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分析，風傳媒，2017/9/30，<http://www.storm.mg/article/336898>，最後瀏覽日：2017/12/11。

A Study of "Free China" to Discuss the Role of China Youth Corps in 1950s

Jen-Wen Cheng *

Abstract

Facing the plight of pursu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under the domestic authoritarian rule, intellectual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propagated the concept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running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1950s was a turbulent era in Taiwan. The tragic history began with 228 massacre, happened on Feb. 28, 1947, the Kuomintang regime suppressed the people's resistance, which killed at least thousands of civilians. However, in Mainland China, the KMT was def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after 1949. In 1950s, the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empower its ruling tricks by "the Temporary Provisions on the 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and "the Martial Law". As the democracy consciousness raised, the intellectuals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liberalism by initiating "Free China" magazine as well as oppose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During that period, China Youth Corp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promoting the fanatic and dictatorial Party-State education, which was certainly reviewed and criticized by this magazine.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explore the criticisms embedded in 1950s, which "Free China" has made in regard to the system, function, purpose and funding of the China Youth Corps. We do hope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aiwan in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je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behind as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poli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D.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yat Sen University.

Keywords : China Youth Corps, Free China, Transitional Justice,
Party- State education